学术与文化

近代上海口岸知识分子的兴起
——以墨海书馆的中国文人为例

王立群

［**摘要**］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王韬、李善兰、蒋剑人、管嗣复、张福僖等中国文人陆续进入墨海书馆工作，成为通商口岸第一批与西方人合作的知识分子。与传教士的合作译书工作使他们逐步了解西学，肩负起向中国输入、传播西学的历史使命。他们所翻译出版的西方科学文化书籍，促进了西方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墨海书馆　西学东传　传教士　口岸知识分子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 - 8587 (2003) - 03 - 0097 - 10

The Rise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Modern Shanghai: An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Working at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s

During the 1840s and 1850s, some Chinese literati including Wang Tao, Li Shanlan, Jiang Tunfu, Guan Sifu and Zhang Fuxi successively joined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s. Thus they became the first group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to cooperate with Westerners. Their translation work with the missionaries enabled them to comprehend Western learning gradually, and to undertake the historical mission to import Western learning to China. The Western technical and cultural works that they translated accelerated the diffusion of modern Western science. Their efforts had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unfolding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墨海书馆可以说是近代西学东传浪潮中传教士在中国建立的第一个据点，1860 年以前在西学传播中起了最重要的作用。鸦片战争战败后，清政府被迫签定了《中英南京条约》、《五口通商章程》、《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等丧权辱国的条约，开放上海、广州、福州、厦门、宁波等五处为通商口岸，允许英国人在通商口岸居住、贸易和传教。基于 1835 年对上海的考察，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 (Walter Medhurst, 1796 —1857) 敏锐地觉察到上海在以后中英贸易中的重要地位，于是在征得伦敦会的同意之后，决定把传教的中心由南洋转移到上海。1843 年 8、9 月间，他在香港参加了关于《圣经》中译问题的传教士会议以后，取道北上，与在舟山活动的伦敦会传教医师雒魏林 (William Lockhart, 1811 —1896) 会合，一同前往上海。1843 年 12 月 23 日，他们抵达上海以后，立即租赁民宅安顿下来，并且将设在巴达维亚 (今雅加达) 的印刷所同时迁移到上海，定名为墨海书馆 (英文名称为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s)。从 1844 年墨海书馆开始印刷出版物开始，到 1860 年美华书馆在上海立足墨海书馆的活动逐步减少，这期间墨海书馆出版了大约 170 多种书刊，其中数

［**收稿日期**］2002 - 11 - 15

［**作者简介**］王立群 (1971 —)，女，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博士生；北京 100871

学、物理、天文、历史等方面的西方科学知识书籍有 33 种，占总数的 19 %。墨海书馆这一宗教性的印刷机构所出版这些西学著作，对拓展中国人的视野，启发学习西方科学思潮，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为了宣传基督教，他们出版了大量的中文宗教宣传品，可是由于他们的中文能力的局限，很难将基督教义用文言文恰当表达出来，雇佣中国文人协助他们展开这一工作就提到日程上来。从 1849 年墨海书馆的负责人麦都思聘请落第秀才王韬做中文助手开始，一批中国文人陆续进入墨海书馆工作，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批和西方人共事、从而对西学有相当了解的文人。王韬在《弢园老民自传》中谈到，在上海墨海书馆担任中文编辑时，他结交了很多的朋友。“沪上虽为全吴尽境，而当南北要冲，四方冠盖往来无虚日，名流硕彦接迹来游，老民俱与之修士相见礼，投缟赠纻，无不以国士目之。中如姚梅伯、张啸山、周弢甫、龚孝拱，其交尤密。西馆中，则有海宁李壬叔、宝山蒋剑人、江宁管小异、华亭郭友松并负才名，皆与老民为莫逆交。”[1]在墨海书馆工作之余，这群在协助传教士从事翻译工作的“秉笔华士”们经常聚集在一起喝酒谈天，针砭时事，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小圈子。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心墨海书馆中，应聘与西方传教士合作译书的中国人有王韬、李善兰、蒋剑人、管嗣复、张福僖、郭友松[2]等一批中国学者。他们在与西方传教士的合作中，对西学都有了相当的了解，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批兼通中西文化的知识分子，是在上海自 1843 年被划定为通商口岸以来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群体，笔者把他们称为口岸知识分子。通过对上海口岸知识分子的考察，可以了解西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途径与接受情况，从而勾勒出中国走向世界的轨迹。

一、王韬

王韬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第一批资产阶级思想家中的一员，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他曾经游历欧洲和日本，留下了《漫游随录》和《扶桑游记》两部游记，是近代中国最早走出国门的知识分子之一。1874 他在香港创办了中国人创办的第一份报纸《循环日报》，是中国最早的政论家和新闻工作者。1885 年他回到上海，担任格致书院山长，进行教育改革，从而成为近代著名教育家。王韬从 1849 年来到上海，进入墨海书馆工作，协助传教士进行翻译。也就是说，王韬在墨海书馆曾经连续工作了 14 年。他是最早进入墨海书馆工作的中国文人。在这里他接触到了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也逐步改变了自己的观念，成了第一批接受了西方思想的知识分子。

王韬在墨海书馆初期的工作，主要是协助麦都思进行《圣经》的翻译工作。由于麦都思在南洋从事传教活动有 26 年之久，深刻意识到翻译一个易于为中国人接受的《圣经》译本的重要性，所以，远在来中国以前，他就计划把《圣经》翻译成通俗的中文，以便中国人都乐于接受基督教。最初的翻译工作是由许多新教传教团体代表组成的地方委员会做的，1847 年麦都思把上海的传教士组成一个以他为首的五人编译委员会，来具体实施这一工作。从 1847 年 6 月起，他们每天在麦都思在上海的寓所见面，进行圣经的翻译工作。由于麦都思等传教士的中文能力所限，翻译出来的文字很难做到文从句顺。他之所以邀请王韬，就是要借助于王韬的中国文字的功底，对他们所翻译的书籍进行润色，从而比较好地达到传教目的。始终参与这一翻译工作的美魏茶（W ·C · Mile) [3]回忆当时的翻译情况时说：“我们的日常工作是：开始时读一段圣经，然后祈祷，从上午 10 点到下午 2 点半。翻译程序 ……是逐字逐句推敲，使每人都有机会提出他认为最满意的辞句以供选择。代表中一些成员都有当地教师陪同 ……提供了最有价值的帮助。”[4]

王韬很不喜欢所从事的圣经翻译工作。他觉得自己所从事的这种文字润饰工作很没有价值，时常感觉到这样的生活对他来说是一种折磨，是对他的才能的浪费。在给友人的信中他不时抱怨自己的工作处境：“佣书西舍，贱等赁舂，闭置终日，动遇桎梏，学蒙庄之牛呼，为史迁之马走，因此瞢瞢自甘，惘惘不乐，每一念及，行坐都忘。”[5]尽管王韬非常厌恶他所

从事的宗教作品翻译工作，可是由于王韬具有深厚的经学和文章底子，圣经的翻译在事实上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1852 年，《新约全书》出版；1854 年《旧约全书》出版。其中《新约全书》被大英圣书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定为规范精译本而加以推广，一般称为代表本。[6]至 1859 年该书已经再版了 10 次，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这一译本依旧在中国流传，成为在中国流传最广的《新约》版本。[7]据伟烈亚力所说，这一翻译工作在“相当大程度上可以看作麦都思的产品”[8]，而王韬在 1849 年就加入到这一工作中来，就使得他有足够的时间对圣经的修订完稿产生相当的影响。在 1854 年召开的“第六十届传教大会报告”中对王韬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从侧面说明王韬在翻译过程中起到了很大作用：“他（笔者注：指王韬）是有超群能力的人。如果他继续当前这种精神探索，从文字的角度看他将对我们大有裨益。”[9]从这一评价我们也可以看出，代表本圣经的文字风格在相当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王韬。在 1890 年的传教大会上，一位发言者的意见可以说代表了当时许多人的看法：“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它有一种全新的风格。它较好地摆脱了僵化生硬的结构……是它的作者学识渊博的纪念碑……对它最经常的批评不是它的文字上的新颖，而是它不完全符合规则……严格遵循原意……太多地包容一些使人联想到圣者的条规而不是天国的神秘性的字眼……这使……见识不多、神性不够的读者为这熟悉的节律所欺，极易将基督误认作孔子，十分危险。”[10]这一评价应该说是相当公允的。由于王韬的介入，圣经的翻译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水平远在前辈传教士马礼逊和郭实腊所翻译的圣经之上，可以说确实做到了“文辞雅达，音节铿锵”。[11]正因为王韬在这一翻译过程中的突出表现，第二年他便被委任负责修订伦敦会翻译的所有的中文赞美诗，以便“赋予它们一种即使是在最伟大的天才诗人听起来也不会反感的艺术形式”。[12]

除了宗教作品，王韬也翻译了一系列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的书籍，这正是王韬后来所深引为自豪的。[13]王韬在上海时期参与翻译的科学著作主要有五种：《格致新学提纲》、《华英通商事略》、《重学浅说》、《光学图说》和《西国天学源流》等。这些译著都采取了“西译中述”的形式，也就是说，首先由传教士将原文口译给中文助手听，然后由王韬这样的中国助手根据自己的理解用通行的文章体将其表达出来。这是由于当时中国缺乏精通外语的人才、而西方人也不能熟练运用汉语进行表达的状况所决定的。下面我们按照出版时间的先后对王韬的这些译著逐一进行考察。

从 1853 年起，王韬与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 - 1905）开始合作翻译《格致新学提纲》。“格致”一词在晚清可以说是西学的代名词，它的内涵非常丰富，“所包者甚广，如算学、化学、重学、光学、电学、气学、声学、地学、矿学、医学、机器、动、植，几乎无不具。”[14]可以说，所谓“格致”，就是对自然科学知识的总称；而这些，《格致新学提纲》几乎都有所涉及。中国本来是有格致之学的，可是近代研究的人越来越少，很少有专门的名家了；西方的情况恰恰相反，“近日西人精益求精，几于日新月异而岁不同”[15]，因为西方的格致之学远远超出了中土，所以就有必要翻译该书，向国人介绍西方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该书断续译于 1853 年和 1858 年，当时分别附于同年的《中西通书》之后出版。以后王韬又“屡加补辑，多所增入”[16]，所以该书不仅是译著，从某个角度可以说具有编撰的成分。后来该书被修改收入《西学原始考》中。

1857 年，王韬和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 - 1887）合译了《华英通商事略》，在同年的《六合丛谈》第二、六、八、九、十号上连载。该书叙述了东印度公司在东方商业贸易发展的历史以及从明朝万历年间到咸丰年间中英通商历史，指出商业对国家的发展和富强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读史可以明志”，清政府的当局者应该从英国东印度公司贸易的历史中学习他们的贸易经验，发展国际贸易，在与西方的较量中后来者居上。“今日之中国欲制西人而自强，亦莫如由商务始；欲商务之旺，莫如设立商务局始。”[17]中国传统上重农轻商，认为商业之富乃是末富，王韬重商论的提出无疑是对轻视商业贸易观念的批判，是一种非常现代的观念。

1858 年，墨海书馆出版了王韬与伟烈亚力合译的物理学著作《重学浅说》。该书 14 页，所据底本是一本普通力学。王韬在《弢园著述总目》中概括了该书的宗旨："西人于器数之学，殚精竭思，其最奥者曰重学。以轻重为学术，行止升降，必藉乎力；高下疾徐，必因乎理；而所以制器测象者，非此不可。凡助力之器有六：杠杆轮轴滑车斜面螺丝尖劈。赖此可以举重若轻，其中各有算学比例在。"⑱该书介绍了力学的由来与分类，如动力学、静力学、流体力学、气体力学等，并依次介绍了重学总论、杠杆、轮轴、滑车、斜面、劈、螺旋，最后总论重学之理，说明重学与地球、重学与摄力（即现在的引力）之间的关系，以及研究和掌握重学原理的意义。这是近代翻译到中国来的第一部关于西方力学的专著，西方力学史上的重要科学家及其学说在书中基本都涉及到了，如古希腊著名物理学家亚奇默德（今译阿基米德）、意大利天文学家、物理学家伽里略（今译伽利略），研究两物相撞之理的英国科学家瓦利斯，研究时钟摆线之理的荷兰科学家海根斯，研究虹吸问题的意大利科学家多利遮里，奠定古典力学基础的著名科学家奈端（今译牛顿），蒸汽机发明者、英国科学家瓦得（今译瓦特），等等。在西方力学传入中国的历史上，《重学浅说》具有重要意义。1890 年，王韬将其重刊，收入《西学辑存六种》。

1858 年，王韬与伟烈亚力合译的《西国天学源流》一卷出版。这是一部西方天文学简史，原作者不详。该书从《旧约圣经》中有关天星的内容说起，述及古希腊海修德、和马（今译荷马）著作中对天象的描写，亚利斯多（今译亚里斯多德）、百拉多（今译柏拉图）等人的天文观，对多禄某（今译托勒密）、歌白尼（今译哥白尼）、第谷、刻白尔（今译科普勒）、伽离略（今译伽利略）、奈端（今译牛顿）、拉白拉瑟（今译拉普拉斯）、候失勒等在西方天文学史上影响比较大的人物及其学说，较为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天文学发展历史，叙述相当详细。该书的内容，曾经在 1857 年《六合丛谈》第五、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号上连载。

《光学图说》，王韬与艾约瑟合译，这是一本介绍光学知识的入门书。配有插图，浅显易懂。其中论述了望远镜的制造原理和制造工序，非常具有实用价值。

王韬在与西人合作翻译的同时，还独立编写了《西学原始考》、《西学图说》、《泰西著述考》等三部书。关于《西学原始考》，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主要是根据《格致新学提纲》编写成书的。改编后的《西学原始考》俨然成了一部西方科学发展史，将西方在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哲学、法律、建筑、美术等诸方面的重大发现与重大发明都一一作了记录。该书叙述内容始于公元前 2400 年，终于 1874 年，清晰展现了西方科技发展的历史。《西学图说》内容非常广泛，内容包括太阳说、地球赤道图说、行星环绕太阳图说、五星说、空气说、岁差图说、声学浅说、光学浅说、远镜说等等。书中配有 31 幅插图，与文字介绍相呼应，解释说明简洁而准确。《泰西著述考》考订了从利马窦到徐日升等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的西学著述，认为正是由于利马窦开始了西方科学书籍的翻译工作，才使得日后西学在中国传播开来："有明中叶，泰西文士始入中土。自利马窦等出其绪余，竞尚译书，而西学流传遂广。"⑲1889 年到 1890 年，王韬把有关的西书修订出版，名之为《弢园西学辑存六种》，其编排顺序为《西国天学源流》、《重学浅说》、《西学图说》、《西学原始考》、《泰西著述考》、《华英通商事略》。

除了以上科学性译著以外，从 1853 年开始，王韬还开始参与了综合性科学刊物《中西通书》的翻译与编定。《中西通书》是一本年鉴性质的刊物，从 1852 年开始出版发行，每年一册。在为 1859 年的《中西通书》撰写的序言中，他比较了中西历法的异同，分析了近代中国数学、历法落后于西方的原因，认为西学的传入必将推动中国科学研究的发展："由是观之，中外算术，古时皆未造其精。而至于今，中法每不如西法之密，何哉？盖用心不专，率皆墨守成法，未能推陈出新。今西士航海东来，与海内畴人家将以新法，䌷绎各书，明古今历算之源流，代有沿革，嘉惠后学不浅。"⑳咸丰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859 年 1 月 28 日），王韬在日记中写道："时予主修中西

历书，已藏事”[21]。这说明直到 1859 年王韬还在继续从事这项工作。该书既有宗教方面的内容，也有中西历对照、世界要事、科学发明、天文知识等方面的内容。

王韬所翻译的这些科学性的书籍，在中西科技交流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当他还在墨海书馆工作时，就经常有人向他索取这方面的书籍，他也经常将自己的西学译著作为珍贵的礼物赠给友人。在墨海书馆的工作为王韬打开了一个崭新的窗口，使得他以后走上了倡导资产阶级改革的道路。王韬在介绍、传播西方科学文化知识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是近代科学传播的先驱，其筚路蓝缕之功不可埋没。

二、李善兰

墨海书馆聘请的第二个编辑是晚清著名数学家李善兰。李善兰（1811—1882），字壬叔，浙江海宁人，诸生出身。1852 年农历 6 月，李善兰来到了上海，专程到墨海书馆的礼拜堂拜访麦都思，请他对自己的数学著作进行评价。这时的李善兰已经创立了尖锥术、垛积术，写下了《方圆阐幽》、《弧矢启密》、《对数探源》、《垛积比类》等数学著作，可以说是一个著名的数学家。伟烈亚力深深为他的数学造诣所折服，当即聘请他为翻译数理化西书的助手，从而开始了李善兰与西方人合作翻译西方科学技术书籍的译书生涯。在李善兰到来之前，墨海书馆印刷出版的书籍都是宗教宣传品，其翻译出版西方科技文化书籍就是从李善兰进入墨海书馆开始的。

1857 年，李善兰和伟烈亚力合作翻译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后九卷出版。十七世纪初，徐光启与意大利来华传教士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前六卷，其后一直没有人继续该书的翻译，李善兰年少时读的就是这一不完全的版本，“年十五读旧译六卷，通其义。窃思后九卷必更深微，欲见不可得，辄恨徐、利二公不尽译全书也。”[22]李善兰和伟烈亚力从 1852 年开始翻译此书，“凡历四寒暑”[23]，才完成了这一翻译工作。该书经过顾观光（1799—1862）、张文虎（1808—1885）校订后刊行。可惜由于该书初版不久就遭遇战火，没有广泛流传。1865 年，曾国藩资助李善兰在南京重刻了此书，并且把当时已经比较罕见的前六卷一起出版，曾纪泽为该书所作序文，曾经曾国藩亲自审订。据曾国藩在 1865 年 9 月给曾纪泽的家书中说：“泽儿前寄到之《几何本序》尽可用得，即由壬叔照刊，不必待批改也。”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几何原本》全本，对清末我国数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翻译《几何原本》的同时，李善兰“朝译几何，暮译重学”，还与艾约瑟合译了英国物理学家胡威立（W. Whewell，1795—1866）的《重学》二十卷，附《几何原本圆锥曲线说》三卷，于 1859 年由墨海书馆出版。全书分为静重学、动重学和流质重学三部分。这是中国近代科学史上第一部包括运动学、动力学、刚体力学和流体力学的力学译著，也是当时中国最重要、影响最大的一部物理学著作。

1859 年，墨海书馆出版了李善兰和伟烈亚力合译的《谈天》十八卷。《谈天》原名《天文学纲要》（The Outline of Astronomy），是英国著名天文学家约翰·候失勒的著作。此书在西方曾经风行一时，流传甚广。《谈天》是根据原书 1851 年新版译出的。其后徐建寅又把 1871 年的最新的天文学成果补充进去，于 1874 年出版了《谈天》增订版。西方的近代天文学知识，自明末清初以来，已有一部分传入中国。乾隆年间，哥白尼的日心说也开始传入，但其影响不大。由于从雍正到道光一百余年的闭关自守，使得很多中国学者盲目否定西方的科学成果，甚至认为西方的新成就不是中国古已有之，就是中国技术的西传带来的。《谈天》对天文系的结构和行星运动有比较详细的介绍，此外，如万有引力定律、光行差、太阳黑子理论、行星摄动的理论（其中其轨道根数摄动的几何解等）、彗星轨道理论等方面也有所叙述。对恒星系，如变星、双星、星团、星云等等也有一定篇幅的介绍。这样，包括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为止的西方近代天文学知识便大部分传入了中国。

李善兰在《谈天》的序言中据理驳斥了阮元对哥白尼学说的荒谬看法，利用西方天文学的发展历史事实说明科学的发展正是来自科学家不断探索真理，不断“苟求其故”的结果。

李善兰用恒星光行差和地道半径视差等来证明地球绕日运动，用矿井坠石证明地球自转，用彗星轨道、双星相绕运动等证明行星轨道确为椭圆等等，从而进一步说明西方天文学成果不容怀疑，是"定论如山，不可疑矣"。由于李善兰等的努力，从哥白尼开始至牛顿完成的建立在牛顿古典力学体系上的西方近代天文学知识便比较系统地传入了我国。后来的一些著名的改良主义者如康有为、严复、谭嗣同等人都曾利用哥白尼日心说和康德、拉普拉斯的天体演化学说等等，作为批判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为改革变法制造舆论。

1859年，墨海书馆出版了李善兰和伟烈亚力合作翻译的《代数学》十三卷和《代微积拾级》十八卷。《代数学》，原著棣么甘（A. D. Morgan，1806—1871），内容包括代数方程、方程组、指数函数、对数函数以及幂级数展式等等。这是中国第一本符号代数译本，西方通用的很多数学符号都是第一次在中国数学著作中使用。《代微积拾级》所据底本是美国数学家罗密士（E. Loomis，1811—1899）的《解析几何与微积分初步》（Elements of Analgitical Geometry and Differential and Integral Calculus，1850）。这是一部高等数学教科书，内容包括代数几何、微积分等等。这本书的翻译第一次将高等数学介绍到中国来，在国内外数学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同年，李善兰和韦廉臣合译的《植物学》八卷出版。该书译自英国植物学家林德利（J. Lindley，1799—1865）的《植物学纲要》（Elements of Botany），是当时我国唯一的一本植物学。该书问世以后，颇受学术界好评，被认为是了解西方植物学最好的入门书。

李善兰还与伟烈亚力、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合作翻译了英国科学家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四册，译名为《数理》。在《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中，傅兰雅说，1867年前后李善兰"又与伟烈亚力译奈端《数理》数十页。后在翻译馆中与傅兰雅译成第一卷。此书虽为西国甚深算学，而李君亦无不洞明，且甚心悦，又常称奈端之才。"[25]可惜此书没有译完，当时也没有出版发行。丁福保在《算学书目提要》中谈到了李善兰等翻译的这一著作："奈端《数理》四册：英国奈端撰，伟烈亚力、傅兰雅口译，海宁李善兰笔述。是书分平圆、椭圆、抛物线、双曲线各类，椭圆以下尚未译出，其已译者，亦未加删润。往往有四五十字为一句者，理既奥赜，文又难读。吾师若汀（华蘅芳）先生屡欲删改，卒无从下手。后为大同书局借去，今已不可究诘。"1995年，韩琦先生在伦敦大学意外发现了李善兰等的这一译本，内容包括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的定义、运动的公理和定律，以及第一编"物体的运动"的前四章。

自从李善兰进入墨海书馆，王韬就和他成为好友。李善兰刚到上海时住在大境，1852年7月（李善兰同年5月进入墨海工作）6日，王韬去大境李善兰的住所拜访了他："薄暮，正斋来舍，与之散步城闉至大境阁访壬叔"[26]。从王韬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出，在1852年10月间，他们几乎每隔一天就互相拜访或共同喝茶饮酒一次。上海画家胡公寿特地为王韬、李善兰和蒋敦复作《海天三友图》，以志三人深厚友谊。

1859年，李善兰应聘入好友江苏巡抚徐有壬幕府。1862年5月，进入安庆曾国藩幕府，参与军械所轮船、炸弹制造等事务。1864年5月，供职于金陵书局。正因为在翻译西书的同时也获得了大量的自然科学知识，1868年8月，李善兰被清政府专聘为北京同文馆算学总教习，直至1882年去世。

李善兰堪称将西方自然科学著作翻译介绍到中国来的成就最突出的中国学者。李善兰从1852年进入墨海书馆工作，前后参与翻译的西方科学文化书籍有《几何原本》（后九卷）、《重学》、《几何原本圆锥曲线说》、《谈天》、《代数学》、《代微积拾级》、《植物学》、《数理》等八种之多。他所翻译的这些科学书籍，多为中国近代科学史上的开创之作，影响深远。他所创造的一系列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名词，如代数、未知数、函数、单项式、多项式、微积分、系数、常数、变数、分力、合力、植物学、细胞、光行差、月行差、视差等等，直到今天仍在使用，为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张福僖

1853 年，李善兰介绍自己的好友、中国近代物理学家张福僖进入墨海书馆工作。张福僖（？—1862），字南坪（又作南屏或者南平），浙江归安（今浙江湖州）人，秀才出身。《畴人传》对张福僖的评价是“精究小轮之理”[27]。“小轮”是托勒密天文学体系中的概念，在明清之际经由耶稣会士传入我国，这说明张福僖在到墨海书馆工作之前已经对西学有所接触。从 1839 年起，张福僖师从钦天监博士陈杰[28]学习。他对张福僖在求学期间写成的《两条夹角求对角新法图》非常赞赏，将之作为附录收入自己所编的《算法达成》中。此外，张福僖还编写了《彗星考略》、《日月交食考》二书。

1853 年，张福僖与艾约瑟合作译成了《光论》。这本书当时墨海书馆没有付印，后来收入江标（1860—1899）主编的《灵鹣阁丛书》中。1936 年，该书又被收入《丛书集成初编》。

《光论》是最早把西方近代光学知识系统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本光学著作，所据底本不详。《光论》正文约六千字，附图十七幅，全书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几何光学的内容，如光的直线传播、光的传播、海市蜃楼、光的照度、色散、光谱等等。在我国，正确地描画光路图也始于《光论》。从《光论》的内容来看，其所根据的底本似乎不止一种。后九节约占全书内容的三分之一，其内容相当琐碎，每节之后都表明应该插在书中的哪个地方，例如“以上在论目光之前”、“在松紧不平一条后”、“分别七色后一条”等等，这说明这些内容不是原本上的，而是从当时的各种报刊杂志上摘录来的。可能由于当时该书没有安排出版，所以译者也就没有对这些材料进行进一步的整理。严格说来，本书是一个未完成本。

1859 年，张福僖应担任江苏巡抚的同乡好友徐有壬（1800—1860）之邀入徐府当幕僚。当时徐有壬正在刻印的《项学正象数原始》等著作，就是二人共同校对的。其后不久，李善兰也携带自己的数学著作到了徐有壬处。1862 年，太平军攻陷湖州。张福僖冒险前去探望在城中的母亲，结果被太平军俘获，不幸被当作间谍杀死。张福僖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在当时就被人们所称许，在他去世以后有人写诗赞道：“平生性质直，颇有前贤风。廿年学算学，列宿横心胸。书成彗星考，西法皆开通。携来吴市上，倾倒抚部公。”[29]

四、蒋敦复

蒋敦复（1808—1867），字茂才，一字纯甫，号剑人，上海宝山县人，诸生出身。1852 年 12 月跟王韬相识，在参加 1853 年上海小刀会起义失败以后，他避居王韬家中，其后不久经王韬的推荐进入墨海书馆工作。蒋敦复的遭遇非常离奇，年少时就以才气闻名，形成了恃才傲物的性格。因为得罪了权贵，畏罪避祸，削发为僧，释名铁岸，入月浦净信寺和罗[illegible]之善福禅院。好友们觉得他这样太浪费才华，劝他还俗，于是他听从朋友的劝告还俗参加了乡试，结果才子的名声不胫而走。不幸的是，不久他沾染上了鸦片，虽然姐姐多次帮助他，生活也没有多大起色。

自称在文章写作上“大江南北无与抗手”的蒋敦复，喜欢“被酒谈兵，以经济才自负，亦奇男子也”[30]，是苏松之地文名甚高又颇为狂傲的人物。他性情高傲，愤世嫉俗，认为“沪中可与语者，唯有玉华一片石耳”[31]，与王韬、李善兰同被时人称为沪上“三狂士”。1854 年，经艾约瑟介绍，他开始与法国巴黎的汉学家儒莲通信。他向儒莲纵论中国文学，并协助儒莲翻译了《大唐西域记》。蒋敦复在墨海书馆的主要工作是帮助慕维廉学习中文。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蒋敦复根据传教士们的口述编写《寰境》16 卷，介绍地球四洲之情势。1856 年 7 月，蒋敦复和慕维廉合作翻译的《大英国志》8 卷出版，此书尚未出版即被上海士人争相传抄阅读，成为人们了解英国情况的必读之书。据说在此过程中，蒋敦复本人也编纂了一部内容更为详尽的英国历史著作，但是一直未能出版，手稿也没能保留下来。1857 年 2 月 24 日出版的《六合丛谈》第

二号上刊登了蒋敦复的《海外异人传：该撒》。在《华盛顿传》中，他介绍了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的生平事迹，赞美了华盛顿功高而不迷恋"皇位"的崇高行为，并借华盛顿之口说："有国而传子孙，私也；权重而久居之，乱之基也。"这显然是有感于中美政治的本质差别而发的议论。可以说，经过在墨海书馆七年的工作，他已经成为谙熟某些外国事务的专家。

在墨海书馆工作的七年，也是王韬与蒋敦复从相识到相知的七年。王韬日记中对两人初次相识一同饮酒的记载颇具有戏剧性。王韬、李善兰、蒋敦复等一同到黄垆狂饮，联句作诗，热闹非常。饭后，他们陪吸鸦片上瘾的蒋敦复去妓馆吸鸦片，蒋敦复打碎了别人车上的玻璃，结果跟在他后面的李善兰成了替罪羊，被人抓去，直到第二天才被放回来，"羊裘已去，席帽亦无，形容殊狼狈也，余心为之恻然。"㉜但是，不打不相识，自此以后，三人成了莫逆之交。

1860 年 9 月，上海县令刘郇膏聘请蒋敦复编写《上海县志》。其缘起是由于同年早些时候刘郇膏从邑人徐渭仁散失出来的藏书中发现了明嘉靖年间的上海县志——从康熙至嘉庆年间虽然四次编辑上海县志，编纂者都没有见过这个本子，当然更谈不上利用其中的材料了。所以，刘郇膏特地聘请沪上名士蒋敦复参校旧志编定一部比较准确、比较完全的县志。蒋敦复也积极投入这一工作中。不巧的是第二年刘郇膏就离任了，所以这一工作也就被无限期地搁置起来。蒋敦复写成了沿革表、官司选举表、宦绩、人物传等六卷。到同治年间俞樾等编辑上海县志时，采用了很多蒋敦复所整理编写的材料，沿革表则完全采用了蒋氏所编的县志。清光绪《宝山县志》卷十二艺文志以及民国《真如志》都记载了蒋氏所编的县志，书名就直接写作"上海县志"。《上海地方志综录》将其附录为"有关上海志书籍"第三种。因为该书编辑于清咸丰年间，并且原书没有完成，所以后人一般将该书称为《（咸丰）上海县志稿》（六卷）。1864 年，蒋敦复应聘入苏松太兵备道丁日昌幕府。1867 年去世后，俞樾将他的遗稿编次出版，这就是《啸古堂文集》八卷。

五、管嗣复

管嗣复（？—1860），字小异，江宁（今江苏南京）人，秀才出身。他的父亲是管同，字异之，是桐城派著名的代表作家，曾入桐城派大师姚鼐之门，文学上颇有成就。管嗣复幼承家学，精文善诗。另一方面他对传统的医学有所研究，擅长岐黄术。1853 年，太平军攻克南京，他被迫从事文书工作。一年之后，他伺机逃出，在无锡遇到了在墨海书馆工作的伦敦会传教士艾约瑟，艾约瑟非常佩服他的才气，于是把他带到了上海。这表明他大约在 1854 年进入墨海书馆工作。在墨海书馆见到传教医师合信（Benjamin Hobson，1816—1873），二人谈起医学，非常投机，于是开始合作翻译西方医学书籍。王韬在 1858 年的日记中记载了管小异进入墨海书馆的缘起和翻译西方医学书籍的过程："近得新知数人，乐数晨夕，旅窗得此，聊以破除烦懑。一江宁管小异，一吴门梁阆斋，一姚江周双庚。小异名嗣复，江宁茂才，家乡残破，避难邓尉。西士艾约瑟至吴遇之，与之谈禅，极相契合，载之俱来，同合信翻译医书。一载之间，著有《西医略论》、《妇婴新说》二种，俱已锓版。合信自谓二百年后，此书可不胫而走矣。"㉝

1857 年，《西医略论》出版。1858 年，二人合译的《妇婴新说》和《内科新说》出版。合信在《内科新说》序言中描述了与管嗣复合作翻译西方医学书籍的过程："近岁来上海，因华友管茂才喜谈医学，遂与商酌，复著《西医略论》、《妇婴新说》及《内科新说》三书，皆发明《全体新论》，以广其用。"㉞《西医略论》共三卷，上卷总论各种病症，中卷分论身体各部位表现出来的病症，下卷总论医药与处方。在上卷收入了的《中西医学论》，这是近代最早的比较中西医优劣的医学论文。该论文认为中医有两个方面落后于西医：第一，西医都接受正规的教育和严格的训练才算合格，而中医则没有接受专门的培养，往往靠师傅指点和自己摸索来获取医学知识，从业也不需要通过任何的考核，导致中医的水平良莠不齐；第二，西医重视解剖学，而中医则从来不知道也

不关心人的内脏究竟如何，只是根据医书的记载和自己的从医经验对病人进行治疗。论文还批评了当时比较流行的西药适合于西人而不适合中国人的说法。《妇婴新说》是关于妇科、儿科的著作。《内科新说》两卷，上卷总论病理及治法，下卷记载方剂小品，分为东西本草录要、药剂和药品等等。

上述三种医学书风行一时，受到了人们的重视；而通过翻译工作，管嗣复对近代西方医学有了相当的了解，成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兼通中西医学的学者。在给徐谷春《海上卖药图》的题诗中，他写道："我朝艺术超汉唐，吾所服膺喻徐黄。迩来略习泰西法，所论藏象殊精详……此中源流吾所知，纵横辩论人称奇。"[35]他论述了中国医学的历史，比较了中西医学的特点，肯定了西医的准确的优点，正如王韬对他的评价，"颇能琢抉医学源流"[36]。

1859年3月，他开始协助裨治文翻译修改《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王韬日记中对此有所记载："小异于裨治文处，译改《美理哥地志》，已得数卷。美利坚，新辟之地，人至者少，是编乃裨君纪其往来足迹所经，见闻颇实，倘得译成，亦考证海外舆地之学之一助也。"[37]1861年该书定名为《联邦志略》出版。

1860年春天，他应怀午桥太守之聘，往客山阴。不幸的是，不久，吴门失守，管嗣复四处奔波，结果劳累忧郁而死。

忻平先生在《王韬评传》中提到在墨海书馆工作的还有数学家张文虎，经本人查证，张文虎虽然与王韬关系密切，可是并未在墨海书馆任职。张文虎（1808—1885），字啸山，一字孟彪，别号天目山樵，江苏南汇（今上海市）人，贡生出身。他精通算术之法，兼及经学、小学的研究，是晚清著名数学家。他和李善兰关系密切，经常书信往来，探讨数学问题。王韬1860年3月9日的日记中收入了他写给张文虎第一封信，他在信中谈到自己从李善兰、蒋剑人的口中得知张文虎，虽然从未谋面，但是对他非常钦佩："此间如蒋、李二君，每及执事，辄盛口不置，中心藏之，未面已亲……乃近者郭君友松适馆于此，谈经之暇，偶述执事曾道及瀚，辄加心许，未尝口疵。再聆斯言，驰惶无地。"[38]同年3月28日，王韬收到了张文虎的回信，他特地在日记中转录了这封信，作为两个人神交的纪念："午后，得张啸山复书，笔墨古雅，推誉殷拳，即录于此，以为神交之始。"[39]通过共同的朋友郭友松、李善兰等人的介绍，两人彼此都有了深切的了解，并且惺惺惜惺惺，对对方非常欣赏。二人首次的书信往来有力地证明了其前张文虎从未在墨海书馆工作过。1863年农历五月，他经李善兰推荐至安庆入曾国藩幕府。曾国藩在五月二十一日的日记中对此有所记载："又李壬叔带来二人，一张斯桂，浙江萧山人，工于制造洋器之法；一张文虎，江苏南汇人，精于算法，兼通经学、小学，为阮文达公所器赏"。[40]1864年5月，他被曾国藩委派至编书局（9月之后定名为金陵书局）任校勘，直至曾国藩1872年3月去世之前，一直在该局工作，为保存中国古籍和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作出了一定贡献。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墨海书馆工作的这些中国文人大都取得过秀才的资格，具有很好的文字功底，属于中国下层文人。由于没能顺利踏入仕途，他们多有怀才不遇的愤懑；幸而时代的变化提供了与传统落第文人设馆授徒不同的生活道路，他们来到东西文化激烈碰撞的上海，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批与洋人合作、向国人介绍西学的知识分子。在上海开埠之初，当人们还普遍对西人、西学持敌视、防范的态度之时，他们便冒天下之大不韪为西方人工作，当然受到传统社会的排斥，成为生活在正统社会文化之外的"边缘人"。在大约十年时间里，他们一直生活在中国政治、文化生活的边缘。在中西文化与文明的夹缝中生存这一特殊的处境使得他们行为举止非常怪异，他们时常一起饮酒狎妓，"每酒酣耳热，抵掌雄谈，往往声震四壁，或慷慨激昂，泣数行下，不知者笑为狂生"[41]，令时人为之侧目。当时的形势和国人对西人、西学的态度把这群了解西学、传播西学的口岸知识分子塑造成了上海滩上有名的狂士。

伴随着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洋务运动的兴起，口岸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的命运开始发生戏

剧性的转变。他们日益得到重视，昔日受到人们鄙弃的西学知识反而成了他们得以进入仕途的重要阶梯。他们的人数在逐渐增多，其影响也在逐渐扩大。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这些知识分子大都被清政府的各级官僚聘入幕府工作。这表明，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关注西方、了解西学、学习西学已经成为一股不可抵挡的时代潮流。敞开的国门已经不可能再关上了，中国不再是一个封闭的天朝大国，而成为世界的一部分，输入西学成了当时中国的一个不容忽视的迫切需求。作为中国第一批了解西学并致力于介绍传播西学的近代知识分子，口岸知识分子所起到的开风气之先的历史作用将永远为人们所铭记。

①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一，“弢园老民自传”。光绪二十三年（1897）长洲王氏上海重排铅印本。

②关于郭友松，除了《弢园老民自传》，王韬在日记和其他论著中都没有提到，估计他在墨海工作的时间不长。

③张海明先生在其论著《王韬评传》中，误把 W·C·Mile 当作米怜。伦敦会传教士米怜已经于 1822 年 6 月 2 日去世，不可能参与这一圣经翻译工作。

④⑩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第 24 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

⑤王韬：《弢园尺牍》，卷三，“与贾云阶明经”。清光绪十九年沪北淞隐庐第四次刊刻本。

⑥严格说来，所谓的“代表本”仅指麦都思、王韬等人参与翻译的《新约全书》，但是，由于《旧约全书》在翻译上的处理方式和文体风格与《新约全书》完全一致，所以，“代表本”的内涵被拓展了，一般认为“代表本圣经”这一说法指的是墨海书馆版本的全部圣经。

⑦R. Wardlaw Thompson, Griffith John: “The Story of Fifty Years in China” (New York, 1906), P431.

⑧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p. 35.

⑨The Report of the directors to the Sixtieth General Meeting of the Missionary Society, Usually called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on Thursday, May 11th, 1854 (London, 1854), p. 63.

⑪罗香林：《香港与中西文化交流》，第 78 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61 年版。

⑫The Report of the directors to the Sixtieth General Meeting of the Missionary Society, Usually called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on Thursday, May 11th, 1854 (London, 1854), p. 53.

⑬㊶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一，“弢园老民自传”。

⑭⑮⑯⑰⑲王韬：《弢园文录外编》，附录，“弢园著述总目：未刻书目”。

⑱王韬：《弢园文录外编》，附录，“弢园著述总目”。

⑳王韬：《中西通书·序》。另见《王韬日记》，第 19 页。中华书局，1987 年 7 月版。

㉑㉝㊲㊳㊴《王韬日记》，第 71 页、6 页、107 页、142 页、150 页。中华书局，1987 年 7 月版。

㉒㉓李善兰：《几何原本》序。

㉔阮元：《续畴人传》序。

㉕《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格致汇编》，光绪六年五月。

㉖王韬：《茗芗寮日记》，未刊稿。

㉗赵尔巽：《清史稿》，卷五百七，“畴人二”。

㉘陈杰，中国近代著名数学家，著作有《算法达成》、《湖州府志·天文志》等。

㉙㉚㉛㉟㊱王韬：《瀛壖杂志》，第 93 页、77 页、77 页、92 页、91—92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版。

㉜王韬：《瀛壖杂志》，未刊稿。

㉞合信：《内科新说》序。

㊵曾国藩：《曾国藩日记》，第 1216 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 年 2 月版。